

讀書筆記

《治史經驗談》讀後

進修部中文系 宋源琦

書名：	治史經驗談
著者：	嚴耕望
叢書名：	岫廬文庫
主編者：	王壽南、陳水逢
出版社：	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：	1981 年 4 月初版第 1 次印刷， 2002 年 5 月初版第 11 次印刷
頁碼：	176 頁(四十開本)

內容概述

全書共分為九篇。第一篇談治學時原則性的基本方法；第二篇補充幾條具體的規律；第三篇說明論題的選擇；第四篇為論著標準；第五篇列舉四種論文體式(常行、綱目、複合及綱目變體)；第六篇分述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；第七篇為論文撰寫與改訂；第八篇述及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；第九篇談生活、修養與治學之關係，貫徹整個治學過程。綜合九篇文字，作者歸納概括全書主要內容為下列幾點：

原則上：從大處著眼、小處入手(頁 92、135)，以具體問題為先著(論題選擇，頁 69)，從基本處下功夫(精讀基本材料書並勤於徵，頁 76)；
固守一定原則(原則性的基本方法，頁 1)，不依傍，不斥拒，能容眾說(開闊胸襟，頁 170；不要忽略反面的證據，頁 40)包括各種理論與各種意見，隨宜適應，只求實際合理，不拘成規。
方法是：堅定意志、集中心力，以拙為巧，以慢為快，聚小為大，以深鏗精細為基礎，而致意於組織系統化(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，頁 132)。

目標在：真實、充實、平實、密實、無空言，少皇論，但期人人可以信賴，有一磚一瓦之用(問題的實用性，頁 72；論著標準，

頁 90 等)。

作者於〈校後記〉提到：「常想寫一篇文字，題為治學方法之我見。」是時在民國 51 年除夕，從作者於平時生活記中所摘錄關於本書撰寫的構想標目草稿看來(頁 175)，書中諸多論點始於成書完稿的十七年前即已醞釀於心，對其個人治史經驗早已頗有心得而「盤桓胸中」了。

由此可知作者乃有計劃、步驟(呼應本書內容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二篇所言)，並累積在中國歷史研究工作幾十年的經驗中隨時摘錄心得，直至 1974 年，應香港大學之邀作一場有關討論史學方法的講座，及二年間發表〈治史經驗談上篇〉，載於《中國學人》刊物後，頗受一些青年讀者所重視，迄 1980 年續改訂舊作及增補「論題選擇」以下七篇，新舊二篇合為壹冊。

作者有別於普通文科研究方法論之書(言及方法論對於我的治史不無影響……當我在中國歷史工作幾十年之後，總覺得文科方面的研究，固然也要講方法。但絕不應遵循一項固定的方法與技術，頁 1)，為避免過於執著拘守於固定的技術方法，因而容易走入僵化和紙上談兵的泛論之上，遂依其數十年治史經驗，強調應廣為閱讀基礎史料與有高度成就的學者著作，克服「罔」、「殆」的毛病，以「理」路邏輯思考，用心揣摩體會各學者探討問題的線索，並結合個人的智慧性情、優點與能力為運用，別出心裁，推陳出新，或能成就一家之言。

古云：「貨不必藏於己」，作者將自己寶貴的治學經驗，舉凡治學修養、原理原則與變通及實際工作方面的建議，藉由本書分享給青年史學工作者。

讀 後

初就書單諸多文章中欲意選擇一篇閱讀時，不諱言曾有較「功利」的想法。過程中發現，若為節省時間而擇文章短者為之，因無實際治學的經驗之故，如又對該題旨意涵未感興趣的情況下，實難有較深刻的體會，更無法期待有具體的成效存乎胸中，既然胸無點墨，如何能寫「讀書心得」？為免有斷章取義及過於主觀臆測之弊，於是自不量力地選擇嚴耕望先生的《治史經驗談》一書，縱然不能有所心得，仍期望自己研讀後在為學的態度與方法上有概括性的認識，或可汲取融化於內，有助於累進日後學術資

料之蒐集與處理的能力。

正值閱讀本書至「原則性的基本方法」時，另一門課程要求搜集有關孟子的生平、學說、教育、軍事等資料擇一主題作簡單的摘要。原想僅以某點為題目，隨意蒐集相關資訊，只消拾人牙慧即可交差，而當翻查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時發現太史公對孟子生平記述極少，只得轉求尋索《春秋·左氏傳》，得到如下紀錄：

「邾文公遷於繹。史曰：『利於民而不利於君。』邾子曰：『苟利於民，孤之利也。天生民而樹之君，以利之也。民既利矣，孤必與焉。』」
(魯文公 13 年)

查閱書籍的過程中使我產生了對於「民貴君輕說」的聯想。相傳孟子為邾文公後代世孫，如無錯誤，依《左傳》所載，似在孟子先祖時期，已有此類觀念的雛型，而非孟子所原創的記載(但一般咸認，「以民為貴」的思想由孟子得到具體的闡釋)，實相究竟為何，仍有待後續的考證。不過此一發現，乃研讀基本史料時意外的收獲。以實際蒐集資料的經驗逐一體會嚴先生所言：「要專精也要博通、要看書不要只抱著題目去翻資料」(頁 20)等幾點原則，誠實不虛。

於是我為了「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」(頁 49)的規律，改變了原先蒐集資料態度和方向，為此，比以往更詳讀了《孟子》原典，並輔以時人較可靠的論著為線索，彌補基礎學識的不足(「較可靠論著」意指初學者選擇有註明資料來源的學人著作而言，以利日後需要查證之便)，同時學習留意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係，粗略整理後，窺見孟子生平的概括印象，僅就《孟子》書中就可以看出其生平事略。例如：

樂正子入見曰：「君奚為不見孟軻也？」曰：「或告寡人曰：『孟子之後喪踰前喪。』是以不得見也。」曰：「何哉？君所謂踰者。前以士，後以大夫；前以三鼎，而後以五鼎與？」(梁惠王下)

由本段言及孟子用士禮葬父，便可知其父母之葬時的身分了。其他關於政事稅賦、教育思想等等層面，亦皆不無所獲。此均以研讀基本材料得來，連太史公於撰寫「孟荀列傳」時，亦嘗讀過《孟子》，至今千百年來，學

人們每每翻閱列傳的扉頁，便可聞見太史公爲這位時不我予的聖人發出長嘆。可見精讀基本材料的原則，爲古今學者所通用。

現代各類資料俯拾即是，尤以網路爲便。作者揭示的治史原則性方法及具體規律，在這個時代益顯重要，是學人不可或缺的修養。所以謹慎爲學，相互參證，力求周延，發揮新意，本書雖名「治史經驗」，然學問不應自囿而有差別，治史如斯，治學亦復如是。

在閱讀與實際蒐集資料的過程中，雖切實感受到自己的才疏學淺，卻也樂意學習，逐漸地累積學識。就個人查閱有關孟子資料的過程，亦發現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所載孟子在梁惠王 35年(周顯王 33年，西元前 336年)至梁國，其至梁時間，究爲何時爲確，似仍有爭議之處……後於學者論著資料顯示，《竹書紀年》記載梁惠王 36年後改元從 1 年始，至 16 年而卒。孟子有可能在惠王後元 15 年(周慎靚王元年，西元前 320 年)至梁，時年 53 歲，故惠王一見孟子，便問「叟不遠千里而來……。」《禮記》言「五十始衰」、「五十養於鄉」，若由此觀之，時稱孟子爲「叟」似很合理。

是故，我想，若後人治史時，發現他所依據的材料「比較正確而且正確的傳承下來」，在仍保持原文記載的原貌之下(謹記「不要輕易改字」之規律)，思考是否有可能嘗試將其重要的發見，取法今時《憲法》增修條文的作法，附錄於原典書后，或另有其他適宜的方法，能方便未來初學者搜尋史料之時，省去重覆查閱之苦？乃至未來再有可信的新發見時，再作修訂。如此亦可多少避免治學時因忽略所發生的謬誤。果能如此，是否有益於整個學術界的交流與治學的效率呢！

治學在求廣博通達，且謹慎客觀，但期人人可以信賴。作者甚至於篇章之中引用了其學術批評家好友楊聯陞先生之「充實而有光輝」一語作爲論著的標準，爲求進一步確認與好友本意是否相合，遂去信請教，覆函曰：「……一語出自《孟子》……依朱注似指德行修養，但引爲論著標準，似無不可。……必欲吹毛求疵，則『永久價值』或可改作『長久價值』……。」(頁 97)直言無隱，卻不失誠懇切實，得見學者相互間求好與警戒的用心，正與作者文章不掩其瑕，「聞過則喜」的修養，彼此輝映。使讀者於文中

可稍稍體會治學過程，雖有苦處，而學人砥礪之間，亦有難以言喻的快樂存焉其間。

關於此，我亦在《讀書報告寫作指引》(林慶彰、劉春銀合著)之第七章第四節看到類似作法，是書提到王壽來先生所建議的書評人十戒之一：「書評寫就後，就教於你所尊敬的人」云云，將寫就的文章，請教於人，以彌補自己主觀上的不足，正好與作者的治學習慣相應，可見得學問之道有許多相通之處，謙虛而能涵納其大也。

史學論文特重搜錄材料的完整性，「等到搜集得很完備時纔開始撰寫」是作者所建議的(這樣可以一氣呵成)，最好兼而能有實用性，所以資料整理後必須寫作為文，期望對社會家國有所貢獻。

寫作不單是爲了發表爲人所知，貢獻社會。寫作為最精細的閱讀，此爲研究工作最重要、最嚴肅的最後階段。沒有經過嚴肅的考驗階段，就不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識(頁 143)。

寫作除了解決問題、力求周延外，不可不顧慮讀者的感受。換言之，文章完成後透過閱讀，才算得上爲一完整的創作，文字自此有了生命，所以需在論題、體式的選擇及引用材料與注釋方法下功夫(頁 98~124)，以期讀者能更方便閱讀爲好。

另外值得一提，個人亦覺重要的是，作者於書末二篇，以親身經驗現身說法，談到學術工作與生活、修養的關係，強調立志和計劃的重要。指出這種志趣抱負：「不專爲己，兼要爲群，對於社會人群有一份責任感。」立志者有遠大的目標(志氣)，自然不爲社會環境所控制(隨波逐流)，緊接著採取實行的步驟(要有長遠可行的計劃)，依此志氣與計劃，才能長時間持續，堅強地努力下去！作者一再提醒青年學人，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，對於學術工作的影響極大。保持身心健康，投注心力，淡名利、避權位，以堅定的信念作學問，以客觀的態度容受眾說，不僅有所堅持，也能適應靈活，如此鍛鍊自己，成爲一個健康純淨的學術人。綜上所述，亦即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。」以此原則謹慎爲學，最終粹鍊出來的成果才能達到「充實而有光輝」(頁 92)的境地。